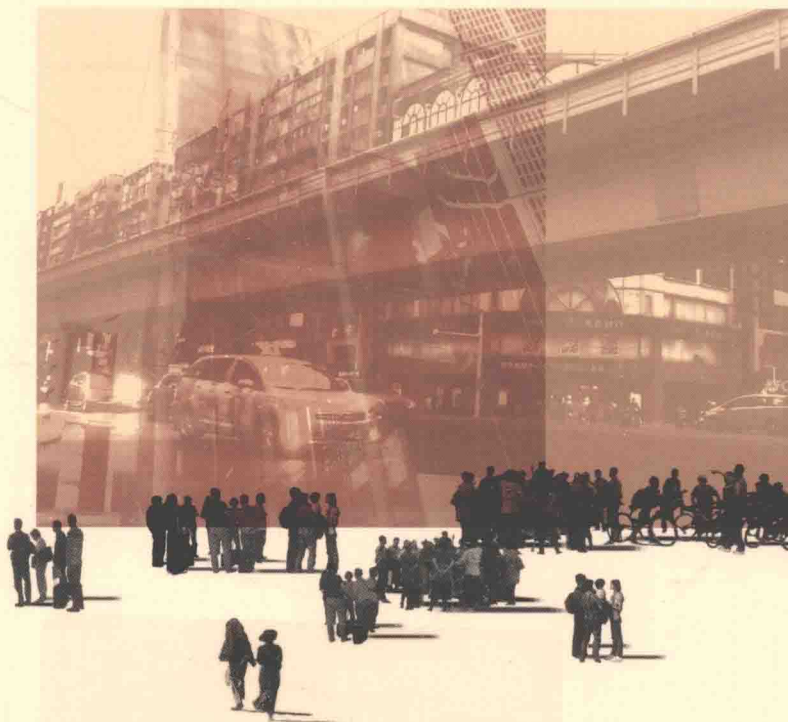


王 辉 著



变革时代中的 流动人口

Chinese Migration People in the
Reforming Er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王 辉 著

变革时代中的 流动人口

Chinese Migration People in the
Reforming Er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王辉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097 - 6774 - 0

I. ①变… II. ①王… III. ①流动人口 - 中国 - 文集 IV. ①C924.
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7480 号



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

著 者 / 王 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赵慧英

责任编辑 / 赵慧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774 - 0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本土化的研究

张展新*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流动人口研究已有 30 年的历史。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最早的流动人口研究学术论文发表在 1985 年的《人口研究》期刊上。以后，这类文献逐渐增多，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政策科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多来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在海外研究者中，既有出国留学人员和华裔人士，也有西方学者。与这些研究者不同，《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一书作者王辉先生出身于安徽农村，在浙江宁波打工多年，是一位“资深”的流动人口。他还有十多年在某村委会工作的经历，这是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农村基层社区。通常而言，学者要把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直接或间接观察；而本书作者既是研究者，也属于被研究者的一员。王辉先生的研究不仅仅是观察和写作，更是凝结了多年的直接参与、亲身体验与深刻内省。正因如此，本书非常值得我们阅读、品味和深入思考。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 12 篇文章，各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将其平生第一篇论文《新宁波人的社区参与》置于全书之首。在我看来，该文集中体现了全书的一条主线，这就是社会关系和文化视角的“本土化”农民工研究。过去的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研究，多集中在正式制度安排上，如户籍制度、就业身份制等，这些探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结构分析研究成果。但是，诚如作者所说，很少有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社会排斥的思想根源。作者提出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儒家“五伦”式村落共同体这一理念，以此出发解读各种针对外来农民工的排斥现象，并从共

* 张展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同体重构的高度上总结了外来工社区参与的进展和前景。作者既研究了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排斥性，又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例如《小传统的冲突》和《2008：春节中的第二故乡》就探讨了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文化融合。《大众的图腾》描述了农民工的大众文化参与和创造，并思考了现行的文化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2：邓小平与中国南方打工者》和《袁庚的选民》两篇文章。在第一篇中，作者敏锐地捕捉到邓小平同志与来深圳的打工仔、打工妹的接触和交流，并把这些与广东的打工文化联系起来。第二篇叙述了袁庚同志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蛇口工业区改革，重点是“思想市场”对普通打工者社会参与、文化参与的影响。研读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领略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地方执行者也是打工文化的倡导者。总之，由《新宁波人的社区参与》引领的这些研究从多个角度，探索了以农民工为载体的文化变迁。

本书另一主线是有关农民工的制度、政策和管理研究。这是现有文献的研究重点，但通常是以资源配置的城乡二元性为导向，多使用定量方法。而作者主要采用了历史事件分析的方法，依托不同政府部门的观察展开研究。在《中国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计划生育与中国流动人口管理》和《公安与中国流动人口管理》三篇文章中，作者针对不同领域讨论了流动人口管理方式的演进。这些研究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论纲，但每篇文章有各自的侧重。第一篇把社区自治解释为自由人的共同体，不仅提出了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立论基础，对社会管理改革与创新也有独到的启示。第二篇提供了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中，计划生育管理曾经扮演了先行者角色。第三篇文章着重描述和分析2002年以前公安部门的流动人口管理，将其原因概括为国家在与新兴流动社会的关系建构上过多依托旧的思维和做法，也讨论了这方面的转变。这些论文，以其独到而深入的思路和成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铺垫了新的取向。

在上述两个研究取向中，本土化研究尤为值得称道。过去有关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的研究偏重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正式制度变革的步伐相当大，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户籍身份的歧视作用不断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研究也需要“转型”，把注意力更多投向文化及其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作者是这一方向上的先行者。

本书的初步建树表明，作者已经步入社会科学学者的行列。这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学术生涯。20年前，还处于中学就学年龄，王辉就踏上外出打

工之路。在打工期间，他曾经做过油漆工等工作，后来通过自学获得大学文凭，也从事过打工文学的创作，是中国第一代的打工作家。对作者本人来说，从文化研究起步，进军社会科学，几乎是走向理想之地的唯一通路。我们很难想象，这会是何等的曲折与艰辛。因此，本书的出版值得特别祝贺。

同时我想，作者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在注重本土化的同时，加强一般性理论与国际比较研究；提升研究方法，引入一些定量研究；深化与主流研究的对话，使研究成果进入国内知名学术期刊；等等。这不是求全责备，甚至算不上什么批评建议——我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资格。这是发自内心的赞扬与勉励，基于我的直感：在学术研究方面，作者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潜质、毅力和能力，完全有可能走得更远、更宽广。

我是在2010年去福建师范大学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时认识王辉先生的。我们的年龄差别很大，我属于上一代人。但是，在几年的交流与交往中，我们之间丝毫没有有什么“代沟”的感觉。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我与作者的思维模式、使用的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研究主题是相通的，不乏学术和情感的共鸣。此次为本书做序，对我来说并非易事，原因是文化研究并非我的专长，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握全书的要点。然而，承蒙盛情邀请，我必须尽我所能，为这位青年学者、友人说上几句，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点参考。

以上片言，是为序。

序二 士的风范

李国强*

王辉兄身上蕴藏着深厚的学养，他的睿智，他的严谨，他笔端下深沉浓烈的感情，让人读其文而身受感染，而想见其为人。从来做学问的学者，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很多，倚马可待者有之，考据精审者有之，大多数人却都无法把自己的研究做得科学且可爱。

当今社会，学术圈也早已沦为名利场，冲进去的人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当别人把做学问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谋生职业之时，当别人把学者当作一种廉价的名头来炫耀之时，王辉却把做学问看成完善自身人格、透视国家与社会、改造现实世界的一条康庄大道。

我与王辉相交十年，从来不曾把他看作通常意义上的“学者”，尽管有时他还争辩起来，真诚地想把自己归到那一类。在我看来，这一简单苍白的称呼无法涵盖他身上的那种独特的气质。是的，我用“气质”这个词。

这种气质可以在过往的历史中找到痕迹，那就是自北宋以来，在被胡适称为“儒学新教革命”之后，那些拔起于寒微的杰出之士身上闪耀的东西。

唯有宋明理学才有这样的感染力，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

王辉常说浙江余姚是他的第二故乡，在我看来，余姚实在是他心灵的第一故乡，正是在这里，他的心灵找到了归宿。余姚，大儒王阳明、黄宗羲的故乡。

王阳明说，圣人必可学而至，使此心纯乎天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黄宗羲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真正的学问

* 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

不在象牙塔内，而在自己的身体力行之中，在经世致用之中，在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高远理想之中。

所以比起“学者”这一称呼，我更愿意用“士”来称呼王辉。是的，我用“士”这个词，古典意义上的“士”，王阳明的“心学”意义上的“士”。

我们来看看这本凝聚了王辉心血的著作。这本书以流动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着当代中国最具有活力的庞大人群和他们的生活展开。

与大多数研究农民工的著作不同，在那些著作中，农民工的生存和收入状况、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等内容反复被分析，而在王辉的书中，农民工的权利、权力和文化成了研究的焦点。

在权利方面，王辉研究了户籍、计划生育与公共安全等正式制度安排是怎样压缩和损害农民工本应享有的权利的，农民工又是如何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利的。

在权力方面，王辉实地研究了农民工在第二故乡是如何参与到政治中的，参与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他甚至还研究了高层权力运转或者说高层决策是怎样影响农民工的命运。

在文化方面，王辉探讨了农民工心灵上普遍存在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迅速变动的现代社会，来自新旧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所有这些方面，又都统一于王辉长久以来的梦想，那就是如何让农民工获得应有的待遇，在第二故乡成为平等的社会主体，在故乡不再格格不入和受人误解，简言之，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不再是漂泊无依的浮萍。

就此而言，王辉关注的问题自始至终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种关注源于生命本能的冲动，源于他通过解答社会问题来解决自己内心困惑的存在方式。这样一种关注是个体生命与社会脉动相交融的产物。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文章和作者的理想如同王阳明年轻时格竹子那样不可理解，可是，也许会有更多的人能感受到王辉那热切的钻研精神，那雄健的思想，和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情怀。

微斯人，吾谁与归？

是为序。

前言

本书是由 12 篇独立成章的论文组成的合集。这些论文，全部是在 2009 年至 2013 年这五年间完成的，代表了我第一段学术生涯的主要成绩。

我将这些论文分作了三个专辑，大家可以看到它们彼此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在第一辑，我主要关注政府管理、政策变迁、政治参与，显然，这些议题展现了我的学科背景——政治学。当我决定进入社会科学、研究流动人口问题之时，我首先学习的是政治学。当我决定向社会学、宗教学、法学、历史学涉入之时，我的支点是政治学。但我不无遗憾地看到，比起社会学，在流动人口问题上，政治学的介入非常之晚，甚至直到如今，研究这个问题的政治学学者也屈指可数。而且，尽管中国政治学曾经贡献出萧公权这样的大家，可比起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国的政治学至今尚不成熟，至少并不是最优秀的学科。

本书的第二辑，无疑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驳杂的部分。我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有公共管理、政策变迁、政治参与，还有民俗、宗教、精神信仰、文化冲突、社会思潮。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动用了所有的知识储备，涉及了历史学、法学、宗教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令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同时又令我困惑的是，我做的究竟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这些研究，固然证明我还算有一些学问，但也表现出我的学科训练还是不成熟的，我对某些领域的了解也是很有有限的。

我在本辑的几篇论文中对两个对象——家乡与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关于什么是国家，已无须我自不量力地下定义了，而什么是家乡——

我则力图对这个概念做出社会科学的界定。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所谓家乡，历来只是一个日常概念、文学概念，而不是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或者说，自现代化以来，所谓家乡这个日常的、文学的而又古老的概念，便在年轻的、政治的、霸权的民族国家主义话语中失去了独立性和正当性，它要么被包裹在民族国家主义的舆论体系之中，要么被视为地方主义而受到政治排斥。而我在一系列研究中努力证明家乡的独立性及其对于中国人的现实意义和超越意义。在这方面，我从研究晚清史的裴宜理、韩起澜、顾德曼、茅海建等学者那里获得了很多的理论支持。

我还要批评的是，当前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一提及流动人口的同乡组织和乡情观念，便往往基于国家主义的思维而将其置于违法的污名化语境之中，其实这种观点非常无知，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同乡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起到的作用与贡献。另外，这种观点也有违人类道德，因为对家乡的眷恋和以乡情为纽带联结成社群，是人之常情，是中国人同时也是人类的基本伦理，是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融合的基础之所在。

本书的第三辑，我选取了三个人物个案，一个是令人深思和叹息的打工仔罗炼，一个是伟大的中国政治家邓小平，一个是杰出的地方改革家袁庚。研究流动人口问题的专家成百上千，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也成千上万，但基本上都是宏观的描述、逻辑的推论、概念的分析，像这样的人物个案研究，则是缺少的，或者说，是由我开了先河的。不谦虚地说，我对这些人物研究颇为自鸣得意，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学术界的朋友，例如为本书作序的张展新研究员、李国强博士，也热烈地给予了回应，表示赞赏。当然，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傅高义先生，他的两本书《邓小平时代》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给了我很多的灵感。我也要感谢吴晓波先生，他的畅销名著《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让我学会了如何从现代商业和民营资本的角度来研究劳工问题。而且，这两位学者身上所特有的那种宏观的历史视野、深刻的学术理论、具体的人物案例、形象的文字表述以及慷慨乐观的激情，深深地启示了我，感染了我，激励了我。

尽管我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训练，但本辑的这三篇论文我想还是可以称为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

那么，为什么当今研究流动人口问题的学者不去研究人物个案呢？须知，人物的背后便是历史过程和社会经验。究其因，除了社会科学主要关

注当下的经验事实，还同学们过于西化、缺少历史感、没有国学修养有关。而民国时代的学者则不尽然，他们既受过良好的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又经过了中国传统学识的滋养。以费孝通先生为例，从《乡土中国》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尽管他自称没有受过国学的训练。到了晚年，费孝通和梁漱溟交往密切，并更多地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思考现实问题。再比如潘光旦先生，他当年出国留学时，随身携带了《十三经注疏》。中国政治学的开山人物萧公权先生，学生时代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兴盛之际，年少的他却对当时的反传统思潮有所警醒。1920年代他在美国留学，其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多元论》纵论西方政治思想历史，一出即受到西方学界褒奖。1930和1940年代，他与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唱和，并完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将西方现代理论与中国传统学识融为一体，当时便被中西学界奉为经典。由此可见，在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或者说要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如果缺少了中国的文化基础，是很难真正做出大成绩的。

另外，即使是研究当下的问题，我们也要有一种历史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口流动之初，只要做一些调查就可以掌握事实。而在如今，改革开放已经三四十年了，要从整体上明白问题之所在，了解一个群体的变迁过程，就无法通过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来达到目的了，因为很多事情已经成为历史，必须基于历史的视野，通过文献的途径，才能全面而深入地去把握。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并非只是始于1978年，实际上，早从184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与工业化、城市化接轨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流动，当时广东和福建的农民前往东南亚和欧美打工经商，而江浙的农民则前往上海。如果阅读晚清的上海史、华侨华人史，我们便会感到历史的流动与当代的流动有着本质相同的规律性。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对人口流动的研究也并不仅仅始于今朝，晚清时代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在当时就已对此有非常敏锐的感知。例如郑观应的《救时揭要》一书中有六七篇文章为“猪仔”鸣冤。李鸿章曾为华工问题与秘鲁进行交涉，并取得了胜利。中国第一个留美学者容闳也颇为关注华工问题，并协助晚清政府进行实地调查。维新思想家康有为逃往海外后所组建的保皇会的群众基础就是同乡同种的华工。康有为对于私营工业非常赞赏，而他所瞧不起的同乡——孙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还是国有化的。康有为的学生兼同党梁启超，在其等身著作中，有《欧游心影录》和《新大陆

游记》两书，主要就是关于欧美华工状况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本书也就是“流动人口问题研究”或“农民工问题研究”。

另外，在清末民初的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有许多同流动农民息息相关。

例如 1905 年的排斥美货事件，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延长了 1882 年出台的《排华法案》，名噪一时的外交家伍廷芳也曾为此进行过外交博弈。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当时及此后的国内战争中，就有数十万旅俄华工的参与，其中有 70 多名华工在彼得堡斯莫尔尼宫担任列宁的卫士。1920 年，当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帮助陈独秀和李大钊筹建中国共产党之时，担任维经斯基翻译的正是来自中国山东的旅俄华工杨明斋。

今天我们都知道，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北京的大学生发起的，但也许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到，当时在法国的华工群体——有 10 多万华工参加了“一战”——跑到“巴黎和会”的现场，与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员进行接触，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在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是国际国内的双重合力，或者说是人口的国际流动与国内流动的双重推进，影响了五四运动，让中国政府赢得了巴黎和会的谈判。

关于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研究已非常详尽，但大都是站在固化的角度，而不是从流动的角度来进行的。尽管影响或参与这些历史进程的人物，实际上大都是流动人口，是现代化早期迁移进城的农民。

而关于当代的流动——农民工问题，学术界的研究也非常丰富，但目光所及止于当下，并未溯源至历史的流动，从而大大局限了自己的经验基础与理论视野。

我本人也是在 2013 年前后写作第三辑论文之时，才明确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今后，我将从改革开放史、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研究人口流动问题，来关注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

最后，我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一说明。

首先，我认为自己采取的方法是“田野调查”。然而，我的田野调查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自从 1994 年起——人口流动大潮全面兴起的时代——我就投身于流动大潮，凡是流动群体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了。即使在 2002 年以后，虽然我从职业地位上与纯粹的底层打工者脱离了，但我还是通过日常生活、学术研究和社区参与等方式与这个群体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凡此种种，让我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事实。据说，西方的许多法学家、高级大法官，原本都是从事实务工作的律师，那么，一个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又为什么不能从具体的社会实务工作者中产生呢。如果不能，就会产生两种局限，一种是一些出身底层的打工作家所自诩的个人经历解读，他们认为主流作家由于没有这些经历从而无法真正了解打工群体，其实这种观点正是反映了默顿所谓的“局内人”的局限。还有一种就是一些社会科学学者一味以置身事外的态度来研究，似乎这样就是所谓的“价值中立”，而这其实也就是默顿所谓的“局外人”的局限。

而我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应是介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诚如王国维先生所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方法，据说人类学产生之初，主流观点是人类学只能研究异文化。然而，中国的人类学一开始便证明——例如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人类学可以研究本土文化。中国的民俗学自产生以来，刘半农、顾颉刚等就强调学者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研究。那么，所谓田野调查，又为何不能研究自己所经历和体验的生活呢？换言之，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又为何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依据呢？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就是强调社会学研究要与自己的生活建立联系吗？

作为一个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此后才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我总是感觉，文学创作所依赖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在哲学的方法论上，有着一致与相通之处。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可以对文学的创作方法做出很清晰的表述，却难以很自信地对我所谓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说出个所以然。故而，在一系列研究中，尽管很多案例来源于我的经历与体验，但我还是尽量“价值中立”地隐于文章的背后，仿佛我所研究的对象完全与我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和本职工作毫无关联。

我所采用的另一个基本方法，就是文献研究。实话说，当我在2002年决定进入流动人口问题领域之后，我做得最多的工作，并不是田野，而是扎扎实实地搜集资料，并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论文、新闻报道、专著。扎实的文献训练，使我形成了自己的“文献感”、“经验感”、“问题感”和“历史感”。通过文献资料，我掌握了学界的研究现状，摆脱了经历的局限，使得自己的研究并不仅仅基于“个人经历”，而是建立在“社会经验”的基础

之上。

我再做一个比较，例如从2002年至2013年，尽管我在一个基层的农村机构中工作了整整十一年，由此积累了深厚的农村工作经验——这些经历与体验，已远胜于我此前八年的打工经历。但是，我绝不敢称自己是“农村问题专家”，甚至不敢贸然进入这一领域。何以故？道理很简单，我在这个领域没有进行系统的文献训练和积淀。

作为一个以问题为研究导向的学者，我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方法是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具体探索而形成的。

- ▶ 序一 本土化的研究 / 001
- ▶ 序二 士的风范 / 004
- ▶ 前言 / 001
- ▶ 第一辑 公共管理与公共参与 / 001
 - 新宁波人的社区参与 / 003
 -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
——关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一个解释 / 037
 - 计划生育与中国流动人口管理 / 057
 - 公安与中国流动人口管理 / 077
- ▶ 第二辑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变迁 / 101
 - 小传统的冲突
——基于浙江余姚市的田野考察 / 103
 - 2008：春节中的第二故乡 / 121
 - 大众的图腾
——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政治文化研究 / 152
 - 暂住证：神圣空间的社会控制
——关于迁徙自由的宗教社会学研究 / 167
 - 仰望星空：第二故乡的聚会 / 179

- ▶ **第三辑 流动大潮中的改革家 / 203**
 - 罗炼：一个打工青年的“中国梦”
——“反智主义”与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现代化转型 / 205
 - 1992：邓小平与中国南方的打工者 / 225
 - 袁庚的选民 / 241
- ▶ **我为什么要研究流动人口问题（代后记） / 266**
- ▶ **主要参考文献 / 279**

第一辑

公共管理与公共参与